

辽宁省文化志

资料汇编

辽宁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部

第二辑

1987

（内部资料）

辽宁人民出版社
PDG

前 言

修志工作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辽宁省文化志的编修工作，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正在按计划进行。现在我们把初步搜集到的部分资料汇编成册，目的在于通过它的辐射和吸引作用，进而得到更多的文化艺术界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提供有关资料和线索，与我们一道完成编纂辽宁文化艺术志的历史使命。同时，通过资料汇编的出版，也可以纠谬正误，保证志书的系统性、准确性。

辽宁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其贯穿南北、连接关内外的交通枢纽，形成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省份之一。在复杂、曲折、动荡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集居辽宁的各族人民在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采的，具有时代特点和辽宁地区特色的文化艺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和全国各地一样，文化艺术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的浪潮中，辽宁的文化艺术事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绚丽多姿、空前喜人的发展局面。因此，在文化艺术志的编纂中，要准确地、充分地反映这一发展进程，首先必须获得大量的翔实的史料。而在这浩瀚的文化艺术大海中，庞杂艰巨的资料搜集工作，绝不是一两个部门和少数专职人员所能承担得了的，必须动员起方方面面的力量，取得同志们的广泛支持，才能收到预期效果。《辽宁省文化志资料汇编》的出刊，仅仅是搜集资料工作的开端，根据资料征集工作的进展，我们还将陆续出版。由于缺乏经验和编辑水平所限，不当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给予批评指正。

在此，我们编辑部全体谨向为辽宁省文化志提供资料和线索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

记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辽东半岛 上的一支文艺队伍——白山艺术学校

孙 康

一九四六年的夏初，中国共产党辽东省委为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培养党的艺术人才，决定在省会安东市（今丹东市）创建一所艺术学校。暂定校名为“白山艺术学校”。四月十日招生广告一贴出，当即受到广大青年艺术爱好者的热烈欢迎，纷纷到校报考应试。

当时学校将学员分为三个队，即戏剧队、音乐队和美术队。校领导由解放区来的白鹰、田风、田少伯、刘相如等同志担任。省委的肖文同志分管学校工作。教员有曹会澄（声乐）、高哲夫（钢琴、日侨）、高晓岚（小提琴、日侨）。校址设在伪协和会馆（今劳动宫）内。学员大都是安东市内的伪满“国高”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另一部分是胶东过来的和从营口撤出来的十几位同志：于华、董伟、张溪峰、柳寒生、纪寒、石菲、于更、陆燃、殷刚、陈凯、马弥瀛、鲍禹等；安东市及邻县的有：于萍、于映、孔力、梁栋、田成仁、曹会萍、王云、刘家声、刘萍（谷音）、李志仁（石宕）、王大明、孙康、王同禹、赵奎英、鲁石、鲁耶、万君球、赛英、董贵义、孙俊英（赛佳）、孙杰、邓华、丁建章、刘枚然、艺田、王璐、杨文彪、于会娟、钟吼、田奎一、张永庆、王石路、王贵林、刘炎清、郝风、王菲、李永信、戴维江（戴昂）、洪家声、于大波、栾耀东、白辰昕、何河、杨明全、曲春华（速航）、柳克杞（柳滨）于二（牧风）、宫殿东、王为、赵育秀、滕光、顾光潜、王政本、白树勋、安洁、董桂香、鲁琪、张忠祥、麻光（麻桂荣）、李洗、石灵、刘成功、郭鹏、路曼、张承舜、张在虞、吕长增、仲洁心、刘长喜、那菲、白燕、陈学文、黄春功、张绍文、戴绍康、胡晓光、孙大为、杨小仲、王岚、王斌（王振玉）、姜云生、孙寒风、等百余人。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动荡不定，学校建制又不够健全，对学生尚未建立政审制度，“脱产”“不脱产”都可以入学。所以学员当中成份复杂、思想混乱、有的是为了找出路、谋生存；有的是为艺术而艺术；有的是为了逃避家庭婚姻；也有个别人为了破坏目的而混进学校的。幸有胶东来的一部分同志和营口撤出来的同志在起着骨干核心作用。

学校当时除了上课外，还排练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活报剧和话剧《家》；乐队则排练了西洋轻音乐《多瑙河之波》、《郭公园舞曲》、《舒伯特小夜曲》等。还根据一些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你是灯塔》、《五月的鲜花》和刘炽的《东北青年进行曲》等简单地加以配器参加演出外，乐队还特组织了一支小型吹奏乐队与活报剧配合到街头宣传。美术队则画了一些漫画到街头张贴，当时最受欢迎的是“活报剧”和《解

放区的天》等。《解放区的天》除了曲调流畅、明快、易于上口外，更主要的是不论唱者、听者，长期听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音乐和黄色的靡靡之音，只有象《解放区的天》这样的歌曲才能将人们长期受压抑的心情迸发出来。

学校为了迎接“军调处三人小组”的到来，乐队赶排了《风流寡妇》等舞曲。

八月份的丹东，自然气候异常炎热，而政治气候也临近沸点。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消息不断传来，尤其是张家口被国民党占领后，形势更加紧张，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一天下午，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听传达报告，内容大致是：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必要时我们将撤出安东打游击去，等等。因大家经过几个月的教育，对党的性质及方针政策已有初步的了解，和党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大部分同志确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所以听完报告并未引起思想上的波动。

这时，政治形势很紧张，物价上涨，人心浮动，加之敌特的谣言蛊惑，使本已紧张的社会更动荡不安。就在这种气候下，八月上中旬，开始了一场全市范围的“坦白运动”。经过党的教育而转变立场的人们，纷纷上台向党交心，在谈清了自己问题的同时，揭发了国民党特务的反革命活动；一些从国统区（沈阳）跑回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跑行商的小贩也都纷纷上台讲述在国统区的耳闻目睹及国民党反动派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罪恶事实，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丑恶行径，更是令人作呕。这一运动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立场不够坚定的坚定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实质有了初步的认识，绝望徘徊的人也向革命方向靠拢了。当然，那种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为蒋家王朝殉葬的人也是有的。就是这样一批青年学生，在党的指引和思想政治教育下，大都转变了立场，坚定了政治方向，逐步地树立起革命人生观，并相继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有些同志在后来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抗美援朝”而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大部分同志至今仍活跃在艺术舞台上；相当多的同志在全国各地的文艺界担当着领导工作，大家虽都霜染两鬓，却仍然孜孜不倦地为党的事业而勤奋地工作着。

八月下旬，省委决定将安东电台主办的“音乐训练班”合并到白山艺术学校，安东“联中”和庄河、大孤山中学的一些同志也相继并入。学校的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倍，刘相如同志也随着“音乐训练班”到了学校。

王大化、颜一烟、刘炽等同志到安东演出了《刘顺卿开辟南泥湾》秧歌剧。这一演出活动对学生们触动很大。看到全新的演出，听到亲切的民族音调。尤其是他们那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以罐头盒制作的乐器，奏出悠扬的乐曲，使大家感叹不已。使一部分看不起民族音乐、盲目崇拜西洋的人也转变了观念，对学生们向民族化方向迈进，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大化同志还到校作了学术报告，并就《兄妹开荒》一剧做了示范表演，深受全校师生们的欢迎。刘炽同志也到校参观，当时我们正在排练由他作曲，我们自己配器的《东北青年进行曲》。他听完后，给以热情的鼓励和赞誉。

上级组织原拟将白山艺术学校改为“白山艺术学院”，以李鹰航、白刃、颜一烟等同志为领导，李鹰航同志任院长。后因形势的急剧变化未果，李鹰航、白刃、颜一烟等几位艺术家北上哈尔滨。

当时在安东地区的艺术团体还有以陈其通为首的军区文工团，后改为独立一师文工团。解放战争打响以后，和白山艺术学校并肩活跃在辽南、辽东解放区。

白山艺术学校除经常到街头搞宣传活动外，还举行了几次大型的专题宣传活动。如：为抗议国民党飞机轰炸草河口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伤而进行募捐活动；为纪念“黑茶山事件”中牺牲的八位烈士；为纪念“八·一五”光复一周年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了我党的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心打内战的阴谋罪行，宣传了群众，教育了群众，同时也教育了我们自己。

十月下旬的某天下午，校领导之一的田少伯同志突然将我们二十几个人找到二楼办公室开会。到会的都是从胶东、营口来的同志，安东地区的只有三、五个人（事后才弄清参加会议的人除党员外就是“脱离生产”的同志。所谓“脱产”就是正式参加革命、享受供给制。要一切服从组织调动，笔者就是从安东市总工会调到学校的。全校一百多人大都未“脱产”。不“脱产”者来去自由）。会议主要内容是宣布，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打响，命令我校准备撤出安东，转移至辽南地区，要求大家严守秘密，做好充分准备，预计一年左右即可打回安东。对未“脱产”的同学们不讲撤退，只讲到辽南一带进行巡回演出。第二天下午在“会馆”大剧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巡回”演出的计划、路线和有关事项。希望大家能一起走，不愿去者可提出申请退学。因为大家已从各个方面得到八路军要撤退的消息，当会议结束后，就有不少人不辞而别了。

撤出的时间定为十月二十四日晚间（以电报大楼的爆炸声为信号——表示已全部撤退完毕）。社会上，物价飞涨，人心惶惶，街头巷尾，群众相互议论着八路军要撤出安东……。我们一些决心撤走的同志，将不能带走的行李、衣着和书籍赶忙送回家中。笔者家中只有一老母，组织上给了四千元东北币让给母亲准备一年的口粮，当我急忙回到家中时，老母一再嘱咐要留个“心眼”，我会意地点了点头，多年的老邻居也前来劝说。我只好随便敷衍几句，急速返回学校。二十三日，许多家属纷纷到校看望子女，无庸讳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拉子女后腿的无疑是占多数的。

我们一少部分同志领了枪支弹药，笔者和几个同志负责乐器，晚间站岗放哨。

二十三日夜晚，异常宁静，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显得格外清亮。唯有几名值勤人员荷枪实弹，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以防敌特的破坏。因为我们准备的充分，骨干力量强，布置的较为严密，尚未发生较大的事件。

二十四日清晨，大家分别将要带走的东西装车运往江岸码头。我们学校分到两只帆船，每船除装物资外，还要乘坐五、六十人。我们乐队乘坐一只，戏剧队乘坐一只，其它人分插在两只船上，男女分别住在几个舱里。

午前船靠在江岸码头上，上、下非常方便。后因家属的哭闹，将船驶向离岸约百米左右的江中。有一位同学的家庭是资本家，父亲装了半麻袋东北币来到岸边让那位同学下来，并说：“你走了我这些钱留着有什么用啊？！”边哭边喊。那位同学坚定地回答：“钱我不要，我要走！”

船离岸边远了，须用小舢板来回驳运，笔者和刘炎清都出生在海岛，从小就喜欢划浆弄船，扬帆使舵的。运送的任务当然就落在身上了，我们二人分划两只小舢板，来回数十趟才把物资运完。这时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住了大家。刘相同志一匹爱马想随船装走，可是一只两根桅杆的小帆船已装满物资和学员，怎能装下这么个庞然大物？！刘相

如同志又舍不得割爱。研究的结果请一位会骑马的同志骑上从旱路赶到大孤山，待大队人马到了那里后一同南撤。鲍禹同志自报奋勇，接受了任务后，骑马扬鞭，向南驶去。遗憾的是敌人二十四日晚已由岫岩方向推进到大孤山，鲍禹同志被俘，吃了不少苦头。（据说四七年冬鲍禹同志找到了学校，结果被押送进公安局）。

傍晚时分，许多家属又赶到江边；有几位不能同行的同学也赶来话别、送行。大家亲切地交谈着，相互勉励、叮嘱。送行的人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母，有年幼无知的小弟弟、小妹妹，有同窗多载的好友，也有热恋中的情人，依依惜别之情，令人凄楚。

夜深了。大家进入了既窄小又低矮且有特殊气味的船舱。因为人多拥挤，只好席舱而坐。只有少数同学仍坐在船舱上面，注视着西北方向。忽然天空一闪，接着是一声巨响——通知已全部撤完。我们的船和邻近新闻学校等单位的船便纷纷扬帆启航，沿着鸭绿江顺流而下。

二十五日午前，我们的船搁浅了。大家纷纷下船捡蛤蜊、挖蚶子、抓螃蟹，好不惬意。一直玩到下午二、三点钟涨潮时，才恋恋不舍地登船向南驶去。

大家睡得异常香甜。一觉醒来，却被眼前的情景吓懵了，好大的浪啊！确切地说，这是涌，高约二、三米，船早已落了帆，舵也不管用了，只能任风浪的摆布，一会儿抛上涌颠，一会儿又跌落到涌底。船老大也无能为力，只是虔诚地跪在船头上不住地叩头，求天老爷保佑。我们的船已处于随时都可能颠覆的危险之中。幸亏大家都被颠得晕船呕吐瘫软在舱里不能动弹，不然，如果随着船摆动，使两舷失去平衡，就有可能翻船了。同船的女同学最小的才十四岁，大的也不过十七、八岁。晕船情况尤其严重，甚至被迫尿在舱里，屙在舱里。只有两名习惯于海上生活的男同学在船上来回爬行，给大家端屎倒尿，清扫呕吐的脏物，传递信息。

船上几天断绝炊烟，饥、渴难忍。但尽管这样，大家却是一个心眼，活着登陆，早日到达解放区，所以非常团结、互相关照。这时，我们对“同舟共济”才有了亲身的感受和真正的理解。

我们的船是遇上了台风，被刮到海洋岛东南方向约五十公里的洋面上。茫茫的大海，见不到任何东西，船依然处在随时都有颠覆的危险之中。据船老大讲，西北角水平线上隐约可见的黑点就是海洋岛，待风稍停，我们这船就奔海洋岛，再拖下去，大家就可能饿死了。我们急切地盼着、盼着……。

二十七日下午风情稍有好转，但仍有五、六级偏北风。小船依然处在危险之中。正在这时，发现西南方向的洋面上冒起了一缕黑烟，徐徐向东北方向移动，渐渐的露出了烟筒、船身。原来是一艘军舰！我们这只小小的木头船，十几条大盖枪，一旦被敌人军舰发现那可就糟了！我们担心地向舱外探头张望着，因距离太远，军舰未理睬我们径自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悠然地驶去了。大家松了一口气。谁知军舰刚走，天空又出现了一架双螺旋桨飞机，航向和军舰一样，自西南向东北，大家又一次紧张起来。大家只好猫到狭小的船舱里。飞机走了，天也黑了。就这样在翻船、被俘、饥饿等威胁之下，担惊受怕地又折腾了一天。

二十八日午前，风暴终于停止了。船老大急忙修好蓬帆、船舵，对着西北角跑起了“偏赶”（就是利用旁风，将帆甩到船的左弦，船舵稍右打，左弦贴近水面，右弦部分翘起，俗语叫做跑偏赶），直奔海洋岛而去。小船满蓬满舵，天大黑以后才进入海洋岛

海域，因不知岛上的底细，只在岛的南面约五百米处落帆、抛锚。远望岛上一片漆黑，时而见到一点光亮，更加重了紧张的气氛。

时间可能已进入午夜，东南方向发现了一只小巡逻艇。我们都把枪架在船舱上，大家一条心，是敌人就凭这十几条枪和他们周旋，决不能缚手就擒当俘虏，因为我们无一点声响，无一点光亮，加上我们船的背后是海岛，能见度不佳，不易被发现。就这样呆了一刻钟左右，那只小艇贴着岛的东部海面向北驶去。

等来东北风之后，小船离开了海洋岛海域，一直向西南驶去，目标选定花园口（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军就是从从容不迫地由此登陆，经由皮子窝而直扑金州的）。次日午后，船老大高声地喊着：花园口到了！我们的船靠了岸。领导命令大家暂不要下船，待情况了解清楚再说，田风同志径直向村里走去。很快就回来了，花园口地区仍在我们手里，大家可以下去到老家找（买）点吃的。大家象出笼的小鸟一样高兴地奔向村里。但时间不久，一骑马挎枪的战士从北飞奔而来传达通知说，敌人已向这儿进攻，距离约有二十华里，让我们速向南撤。田风同志立即下令紧急集合。一点名少了二十来人。哪里去了？原来是集体开了小差。大家都很气愤。田风同志立即宣布：如若再有开小差者，就地枪毙！革命队伍少那么几个人到无关紧要，问题是怕他们走露了风声，对我们造成威胁。我们虽然号称一百多人的队伍，却没有战斗力，好在敌人离花园口还有二十里的路程，于是大家喝了点苞米粥从容地登船南进。船沿着海岸线跑了一夜，次日的上午（三十日）到了皮子窝海域。随着船老大的喊声霎时间小小的船舱沸腾了起来。欢笑声象要把小小的船舱炸开。因为大家异常兴奋，使小船左右摇晃。我们终于战胜了风暴，战胜了饥饿，取得了初步胜利。

大家清楚地看到岸边停靠着一只帆船，很多的人在向我们招手，眼力好的同志抢先地大声嚷着：是咱们的船，那个摆手绢的不是老×吗？那个是……。是的，想不到我们失散一周的戏剧队战友会在这里相会了，想不到突然会师，象给大家扎了强心剂，唱啊，笑啊，蹦啊，跳啊，采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心中的喜悦，岸上的、船上的交织在起，汇成了悲壮的“英雄交响曲”。

我们的船一出安东就被风刮走。戏剧队的同志以为我们早以葬身鱼腹；我们也不知他们的去向，反正凶多吉少。他们还听说和我们一起撤出来船队，有一只被风浪打沉了。大家都以为是我们乘的这只船，双方都在为对方担心，甚至以为无望了。在怀有这种心情的情况下，突然相会，那个兴奋劲是可想而知的。

大约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末十二月初，国民党军队占领瓦房店后继续向南进犯，学校的全班人马又搬到了普兰店东面一个叫矿（gang）洞子的村镇，暂住在一所既无门、又无窗的小学校里，大家搂了些毛草往地上一铺，门窗一挡，中间幕布隔开，就成了男女宿舍。

辽南的气温虽比辽东高一些，但毕竟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我们带的行李不多，棉衣、棉裤又没有着落。好在老天“开恩”没有下大雪、刮大风。我们把带来能穿的东西都穿在身上，形象如何就在所不计了。吃的更不用说，上下顿是大饼子就咸菜。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但大家的精神头却很足。

由于等待上级的命令和御寒物资，在矿洞子住了二十多天。在这期间，主要的工作

就是学习，除学政治理论外，也读读报纸，看看书。印象最深的是学习一篇就国民党××师在凤城地区被我全歼一事而发的评论员文章，其中的内容大致是说我们主动撤出了一些城市，国民党占一个城市就得设防，兵力分散；我们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战，破坏他们的交通运输，又使军需民用发生困难，这样就等于背上一个大包袱。我们则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分而歼之。所以说战争的胜负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敌我有生力量的消长……。这生动而形象的比拟和那富有哲理的论断，使我们这些刚参加革命的青少年顿开茅塞，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跟着共产党走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

十二月中、下旬，我们的棉衣、棉鞋、棉帽发了下来，不论男女老少，一色的兰色列宁服、朱德帽、黄棉鞋。穿着虽不合身，但却暖和。至此，我们由“杂牌军”变成了“正规军”。

上级宣布，由于经济困难，原来领取“脱产费”的干部（脱产费每月二千多元“红票”，非脱产者每月只发五十元津贴费）也改为供给制。对于此事，大伙无不赞同，因为有吃有穿也就满足了。好抽烟的同志都换成了小烟袋，每月供给半斤烟叶，喷云吐雾，倒也有滋有味。

在国民党占领普兰店的前夕，我们按上级的部署准备通过苏军封锁线，进入岗里——旅大地区，以保存力量。

于是该疏散的疏散，该轻装的轻装，枪支弹药也集中起来上缴了。出发时女同志受到优待，她们被装进一辆“闷罐车”里佯装货物和我们的行装一起提前一天通过了“封锁线”。男同志们定在次日早晨通过“封锁线”。早起吃了点饭，每人领到一个约一公斤重的大饼子，拿好自己东西就集合了。田风同志宣布，“封锁线”的宽度大约三、四里路，要大家跑步通过，并动员大家一不要出声，二不要掉队，更不要害怕，一切工作都联系好了。若听到枪声也不要怕，那是向天空打枪装装样子，避人耳目。这么一讲，大家就更放心了。

队伍开始向南走去，约摸一刻钟左右，前面传来口令：“躬腰跑步前进”！大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南跑去，因为是冬季树叶掉光了，大家都裸露在“封锁线”岗哨的视野中，我心中暗想：还是“大哥”帮忙。

我们很快胜利地通过了“封锁线”，大家坐下来一是等车，二是休息，这时感到饿了。拿出大饼子一啃，冻成冰坨了，只是勉强啃点犒儿充充饥。

下午，来了几辆大卡车，上车后向大连方向开去。晚上八、九点钟才到大连市区。车停在中山广场。天黑、灯又不亮，这个广场又有四五个路口，因此，谁也不敢远走，怕转向走丢了。

我们被安置在几栋日本式的房子里，因无暖气，房子里又不见灯火，所以很冷。由于一天的颠簸疲劳，大家很快就入睡了。

校部宣布，我们进到岗里是不合“法”的，对外不能用“白山艺术学校”名称，因此对外改称“建国学院艺术系”，并布置举行联欢晚会的节目。我们乐队除给戏剧队的同志伴奏外，还另组织排练了“多瑙河之波”、“郭公园舞曲”等几首吹奏乐曲。

晚会就要开始了，我们没有演出服，穿的是一色的供给的灰棉袄、黄棉鞋，色调虽

统一，有的已破得露出了棉花，棉鞋也张嘴了。但大家觉着很光荣。集中坐在台下，到了谁的节目谁再上台，按理学院同志们的节目先演，我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以示礼貌。

轮到我们上台演出了，台下正在静悄悄地拭目以待，看看我们是怎样出丑。乐手们坐好后，轻盈而熟练地拿好乐器。静听报幕员清脆的声音：第一支曲子园舞曲《多瑙河之波》。那是我将一首手风琴曲子改编为吹奏乐的。当乐曲在笔者指挥下，以悠扬而甜美的和弦把人们带入无限遐想的意境时，台下鸦雀无声，静了片刻，突然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说明我们这些“土八路”的演出获得学院同学的通过。从此，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密切，互相来往了，并逐渐成了非常要好的战友。

新年前后，我们参加一次为庆祝四七年元旦而举行的集会。当汉奸政记公司经理迟子祥以主席的身份给大家讲话时，我们很不理解，怎么汉奸还当政府主席呢！经过领导的解释，大家才似通非通地“通”了（此人不久被我处决）。

王大化同志因车祸不幸遇难的消息传到旅大后，我们的心情非常悲痛，他在安东市曾给我们讲过表演课，做过示范表演，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全市文艺团体为他专门举行一次追悼会。

年后学校改组，阮牧化当校长，李鹰航为音乐系主任，李莫愁、田少伯付主任，田风为美术系主任，王金山付主任；戏剧系主任由白鹰担任。时隔不久，原旅大中苏友好剧团与我们合并建成立旅大文艺工作团，陈陇任团长，田风任付团长。戏剧队由白鹰、刘相如负责，音乐队由李莫愁、田少伯负责，美术队由王金山负责。在中苏友好俱乐部（通称上友好）举行了新团成立典礼，这时我们搬到了“大庙”（日本的“忠灵庙”）居住。

建团后排练的第一个大型剧目就是歌剧《白毛女》，导演由田风、左凡担任，著名导演王斌同志后期也参加指导排练。剧中主要人物分成A、B两组。白鹰（A）、洪家声（B）饰杨白劳；田少伯（A）宫殿东（B）饰黄世仁；刘相如（A）刘长喜（B）饰穆仁智；白居（A）曲舜华（B）饰黄母；于萍（A）王菲（B）饰喜儿；王大明饰大春；宫殿东饰大锁；田成仁饰虎子，仲洁心饰张二婶；王为饰王大婶，于更饰赵老汉等，乐队指挥由孙康担任，舞台美术由张仲祥、孙杰、刘枚然、赛英、王溪等担任、灯光效果由万君球担任。

我们组成中、西结合的较大型乐队，虽构不成编制，但按具体情况进行简单的配器，音响效果还是较丰满的，观众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加以赞誉说：首次听到这样的乐队，比××还好。虽有过誉，也较符合实际。

排练《白毛女》既是一次实践，又是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和艺术观的教育，她形象地告诉人们，地主阶级是如何地残酷剥削和奴役农民，正象主题歌所提示的那样，旧社会怎样把人变成了鬼，而新社会又是怎样把鬼变成了人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过去这些道理学过了，也知道，但却没有通过《白毛女》的排练来得那么生动、深刻。我有时含着泪花指挥乐队，剧情感染着我们乐队的每一个人，指挥感染着乐手，乐手又感染着指挥，乐队与指挥、指挥与演员，演员与乐队通过指挥的桥梁作用，把感情溶为一体，共同去完成那伟大主题的揭示和艺术创作。

每当杨白劳喝卤水身亡那一击大锣沉闷的响起、大幕徐徐地落下时，演员们哭了，观众们哭了，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白毛女》的排练也改变了我们的艺术观，我们这帮小青年大都来自城市，多年的奴化教育，知识既贫乏又畸型，崇洋崇的很厉害。尤其是搞音乐的，既看不起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广东音乐也不屑一顾。只知贝多芬、肖邦，却不知我们有着更多的古今音乐家，更不知我们民族有这么美好而丰富的艺术财富，大家的认识转变了，对民族民间的东西也产生了感情。这对一些后来从事艺术工作的同志不能不说是一个转折点。

《白毛女》在“上友好”电影院举行首场演出。演出的盛况在《大连文艺史料》中有记载，不再赘述。

自进到大连后，我们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供给制又改为每月发放按80多斤苞米折价的“关东币”，每人每月二千多元。大家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不但可买些有用的旧书和较好的生活用品，也可化个十圆、五圆的买些些零嘴吃和旧日本货了。

这一期间我们享受了一种不成文的待遇，坐电车不要票，售票员同志一看我们的穿戴就知道是从“岗外”来的，你拿钱买票她也不卖给你，以示优待。

四七年的四、五月份我们全班人马到了旅顺口，住在白云山下一座剧场的后台上。晚上上演《白毛女》，白天大家就学习。我们和旅顺联中的关系很密切，联中同学们的思想很进步，愿靠近我们。

五月份，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到了“岗外”游击区（据说一国民党将领乘军舰视察，偷带了大量的伪造的“关东币”，企图扰乱和破坏旅大地区的金融市场，我们为了少生麻烦而暂时离开）。

旅大地区虽为我控制，但终究不象解放区那样，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影响，避免因些小事引起国际纠纷（国民党特务很多，不但打黑枪、纵火，还造谣惑众）。所以大家总有一点“寄人篱下”之感，一听要到解放区，大家乐坏了，恨不得一下子飞到解放区。说不清什么时辰出了岗，反正天非常黑，伸手不见五指，大家每人脖子上围条白毛巾。影影绰绰能看前后一两个人的轮廓，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啊、走啊。“行军路上能睡觉”之说，过去我们都不信，这回我确信一边走路一边睡一觉是可能的了。

前面传下口令，“跟上队伍”。眼见就到我军防线，大家又精神起来了，听说要见到我们自己的队伍，瞌睡虫早已逃之夭夭了，据说驻守在这里的部队是从北满绕过来的“四纵队”。通过岗哨时因太黑看不清什么模样，反正是自己人，就格外觉得亲切。

到达驻地后，大家分住在老百姓家里休息，下午舞台美术队的同志先忙活起来了，在土堆铺席子的舞台上挂幕布，因无电原，就用“汽灯”照明，台口一排三盏汽灯，台中又挂了几盏、亮度虽不够，可是比油灯强多了。

演出就要开始了。台下早就挤满了席地而坐的战士，外围站着的一圈又一圈、里三层外三层的，真是人山人海，少说也有二、三千人。那时没有扩音器，只靠演员的唱功。当乐队奏起“北风吹、雪花飘”的优美音调时，台下一片静悄悄。战士们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当演到喜儿被黄世仁奸污时，战士们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了，高喊：“打死穆仁智”、“打死黄世仁”！为喜儿报仇！有的竟冲上舞台，要打扮演穆仁智的刘相如和扮演黄世仁的田少伯等同志，部队的领导不得不上台进行劝

阻，幸亏在入场前，战士们的枪都收缴了，不然真能开枪！战士和群众的情绪被激怒了。演出—结束就号召报名参军，呼啦啦一大帮登上舞台要求参军打老蒋。战士们也要求早赴前线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连演了好多场。

有一天下午，我们参加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大会：夏季攻势动员大会。会上由林一山政委做动员报告。大家听了真是热血沸腾，可是我们不能随部队上前线，还得回旅大地区。大家有些不高兴，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上级的决定只能是服从。

我们在返回“岗里”之前又到我军控制的其它几个地方演出一些小型节目。因离前线近，不但听到隆隆炮声，而且炮弹经常落在离我们不远的山坳间，炮声有时越来越紧、越近，我们不得不卸下幕布急速地向南开去。

回到大庙又住了个把月（已到六月底七月初），夏季攻势打响了，上级命令我们出岗北上。因旅大向我们学校要一批骨干，经协商留下二十几名同志，其中有田风、于华（女）、梁栋、董伟（女）、张溪峰、柳寒生、钟吼、田奎一、张永庆、王石路、王贵林、陈凯、刘炎青、李作进、路曼、于二一、陈干事及其爱人等同志。我们出岗时又从旅顺联中带出了一部分同学，有：柯英、冉冉、高潮、牧青、伟壮、伟光、米福合、吴青、茹光策等。

到了普兰店，我们住在一家烧锅里。商店已开门营业了，街面上行人却稀少，硝烟虽已消失，但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给人们留下的创伤和余悸却久久难以消除。

夏季攻势进行的很顺利，不消几天就连续收复瓦房店、盖县、大石桥等铁路沿线重镇，边陲丹东也被攻克。瓦房店一解放，我们就随着进驻了。

瓦房店暂为辽南首府。我们学校住在山麓下一座中学内，校部在道西一座别墅里，校舍虽然破旧一些，但环境很优美：背靠郁郁葱葱的大山，校舍外面有一片果园（为学校所有），已经着果，站在校院里极目远眺，瓦房店的全貌尽收眼底。乐队住在东面的宿舍里，戏剧队住在西面临山的宿舍里，创作组、美术队设在校部的大院里，早晨练声、跑步，皆在院里，排戏有大教室，还有一个小礼堂，可彩排、可跳舞，可惜是土地，跳起来是尘土飞扬。学校还附属一个剧场，晚上演电影，还能收入一些做为补助。

我们学校下面就是辽南日报社，紧挨着的是“建国学院”，东面一点是以陈其通为首的独立师文工团，这一带可算是当时的文化区。我校和这几个单位交往密切，最活跃的是课余和《辽南日报》、建国学院之间的兰球、排球比赛，每次比赛，大家都出场助威，好不热闹。

这时省委为充实学校的领导力量，将谢力鸣和吴力（女）两位同志调到学校，谢力鸣同志主要抓创作。学校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又开始了上课排戏。由于国民党的人祸，辽南地区闹粮荒秋粮又未下来，老百姓以伏苹果充饥。省委决定，每个干部每天节约二两粮，支援群众。这一行动给群众以极好的影响，他们用此和国民党相对比、鉴别，得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和共产党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这一正确的结论。

七月份，我们五六个人由田少伯同志带队出发，沿辽东一线招收第二届学生。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是乘坐大马车到达皮口镇的。我们从皮口地区经考试招收了二十多名男女学生，接着又向安东进发，从皮口到孤山通小客轮。我们就从海路奔向孤山。到了孤山后我们改乘卡车去安东。

我们坐的这趟车因无汽油，全烧木头，经常“爬窝”不说，连爬个小坡它也只是喘

喻地乱叫不走道，大家只好下车把它推上去，就这样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安市。大家这次是怀着胜利凯旋的心情返回安东的。田少伯同志布置了一下任务就让大家各自回家休息。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绪是不平静的。走进家门，老母一见，楞住了，问，这是真的吗？原来是国民党一进安东就造谣说：我们这些人在帽盔山被俘，全被枪毙了。

国民党进入安东后，我家即被国民党军官霸占，将我母亲撵到小间里住，门上被钉上“共匪家属”木牌，三四麻袋的音乐书籍和多套交响曲唱片全给卖了。我告诉母亲，安东地区可能出现“拉锯”局面，所以组织上安排让我接她老人家去解放区。老母亲虽不愿离开安东，但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还是高高兴兴地同意跟我们走了。

我们的招生简章一贴出，就有大量的男女青年报名应试。在这次招生活动中，有两位青年应该提一下，一是前面提过的刘存（成）功同志（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他早年父母双亡，由伯父扶养成人，四六年撤退时就是因伯父年岁已高未能跟着走，这回伯父仍不让走，再一位就是我的义妹孙增同志。家中也不让参加，倒不是家庭对革命怀有他意，而是舍不得让他们离开家，我去几次也未谈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革命行动——跑。在离安东的前一天约定好时间地点，准时集合，和我们一起离开了安东去到瓦房店。

新生按专业编队，按时上课，排练，因又增添新的血液，学校更加生气勃勃，每当节日或解放较大城市时，都举行庆祝游行，由我指挥的、由男女同学五十余人组成军乐队，非常气魄地行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男同志大都佩带手枪，神气十足。我们一出校门就开始演奏，用《胜利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等几支曲子联结起来，一直演奏到游行结束，给游行壮大了声势，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们自己留下了美好而甜蜜的回忆。

这年秋天，安东军区为组织文工团向我校要人，学校派田少伯、刘萍、栾跃东、王云、王溪、董贵义、杨文彪等二十余名同志为骨干组成安东军区文工团。

由谢力鸣同志抓的文艺创作活动，随着革命的步步胜利也蓬勃地发展起来。以二十几名从事文学、音乐、美术的同志组成的创作组，不但编辑出版了《文学青年》杂志，发表一些小型秧歌剧和文学作品，还不定期出版了多集《白山歌声》。由谢力鸣编剧、笔者配曲的秧歌剧《盼八路》上演后，深受群众欢迎，上座率很高。

这年的晚秋、初冬，开展了“三查”运动，我们不少同志都属“三查”对象，进行了约一个多月，笔者还算侥幸，第一轮就通过了，有的同志检查三遍四遍也通不过，甚至有些好同志被送回原籍交群众“审查”。其中有的因祸得福，被野战部队要去当了干部，立了战功；有的因出身于地主家庭，到校参加革命被说成是找“避风港”而被送回原籍再也未能回来，从地球上消失了。回忆起这段历史，使人仍然不寒而栗。

四七年底，四八年初，冬季攻势打的非常顺利，辽阳已经解放，我军正在围困鞍山，我校大部分男同志被抽调参加了从事土改的“马芳工作团”。我们提前过春节，乘坐闷罐车到了大石桥，下车后到“兵站”又改乘胶轮大马车从牛庄绕过海城、鞍山直奔辽阳首山。

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但大家的情绪还是挺高的，克服了无冷衣薄夜行军的一系列

困难。

在牛庄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的警卫员小曲同志因同志的枪走火而牺牲了，大家都非常惋惜。未战先亡，有点出师不利。行进中，前方鞍山战役已打响了，大家兴奋极了，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鞍山、辽阳外围从事土改工作，支援鞍山战役。经由向导引路，终于艰难地走到了首山。

因为群众被国民党遭踏的没吃没穿，“破拉子”（高粮不脱壳即粉碎熬成的粥）就盐豆，就是上等的“派饭”。虽然难吃一点，却解饿、去寒。我们属分团，团部由谢力鸣、左凡等同志组成，下设队和小组。笔者被委任为小组长。和乐队的张恒、夏云、隋广礼、朱福合、孙效祖等七八位同志一起到首山附近的三块石开展工作。于更、宫殿东、郝风、丁建章等分别带领工作队进驻其它村镇。

这时鞍山战役已接近尾声。但敌机仍盲目地扫射和狂轰乱炸。我们这个分团处在鞍山边缘，经常遇到敌人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缴获一些枪支弹药，甚至还缴获了几挺机枪。当时笔者只有一支“三块铁”的手枪，仅仅三粒子弹。工作逐步地展开，我们用从地主那儿“起”出来的“大镜面”、“美力根”、“套筒子”、“腰别子”以及“蛇牌”、“花牌”、“张口等”等武器武装了起来，个别队伍有机枪和美制冲锋枪、卡宾枪。总之，一切能用来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武器都尽量发挥其功能，成了一支名符其实的武装工作队。

有一次赵敏同志搭车公出，身背一支手枪，车上有人可能是有意要掉工作队的架，就说：唉！你能把那只雀打下来。赵敏一举枪，叭的一下，果真的打了下来，群众赞不绝口。从此，“工作队的枪法百发百中”就象神话一样迅速的传开了。

武器对我们来说不但增添了斗争工具，而且又壮了胆子，对敌人来说（土匪、地富分子）又起到威慑的作用。尤其是攻克鞍山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因此，工作进展的很顺利，打土豪、分田地、抓地主、分浮财的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就在这时我们三块石地方接连发生了几件事。

当通知全村的贫雇农于次日上午召开斗争大会时，干等也不来人。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分头找贫雇农谈话，了解情况。从谈话中得知，原辽南省主席邹鲁风同志于昨晚乘一辆黑色小轿车回到老家三块石，我们顿时心里亮堂了，很明显群众因不了解我们的政策，更不了解我们的干部，不论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一道理，把我们的省主席和国民党的官老爷一样看待了。经研究，笔者带领两名同志径自到邹主席家里，以工作汇报的形式说明来意，要求主席下令召开群众大会，当着群众的面明确表态（当时也不知哪来的那股虎劲）。邹主席鼓励了一番后，当即答应通知群众召开大会，就说邹主席讲话。我们乐的回去操起大锣边敲边喊，群众一听省主席要讲话，很快地汇集到一起。邹主席开门见山地讲：我是省主席，是你们的省主席，是为贫雇农服务的，我的叔叔大爷家是地主老财，他们虽是我的亲戚，也是我的敌人，我是共产党，就是带领大家革他们的命，你们尽管放开胆子干，工作队让斗你们就狠狠地斗，大家不要怕，我邹鲁风给大家撑腰（大意是这样）。群众沸腾起来了。自此，工作队的威信提高了，工作进展也更加迅速。

还有一件事：一天晚上正在开大会（参加会议的除了我们几个人外，还有贫雇农积极分子和北满来的帮翻队——帮助翻身工作队）。突然有个地主老婆哭丧着脸来报告：他

们给贫雇农“留”的浮财被北满来的担架队抢去了。当时参加会议的积极分子们就炸了，吵吵闹闹地要去打担架队的人。笔者说服大家，并同他们一起到了那家地主家院里，我们一进去，担架队的同志就出来了，争着介绍情况。原来是地主婆将一部分浮财往柴草垛里藏被大家看见抢了下来，准备天亮送交工作队。他们讲的好，贫雇农是一家人，我们不能眼看贫雇农应得的浮财被地主隐藏起来。笔者抓住这一机会反复讲解天下贫雇农是一家人，地主老财一样黑的道理。大家受到教育，进一步认清地主阶级的丑恶本质和贫雇农的高尚情操。

我们奉命向铁道西转移，笔者被任命为工作队长，带领二十来人进驻离鞍山只有5公里的城昂堡（当时设为中心区），我们肩扛大枪、腰挎小枪雄赳赳地向城昂堡方向挺进，早晨出发，下午二、三点钟就到了。进了“村维持会”办公室，我们就明确宣布：从现在起，解散一切组织，全部权力归工作队，原维持会人员只能在家听候处理，不得进行其他活动。违者严惩不贷。宣布完命令他们各自回家。这一举动使贫雇农眉开眼笑，从心里认为工作队是他们的人。

到城昂堡不久就发下了《土地法大纲》，我们一面宣传讲解《大纲》，一面深入了解情况发动群众。由于鞍山的解放，多数群众的情绪高涨，但也勿庸讳言，太子河以北还是国民党占领区，而且武装土匪、清剿队活动也很嚣张，对群众的情绪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是处在边缘地区或称“拉锯”地带，必须时刻防备着敌人的骚扰。

城昂堡是个大村镇。有五六百户人家，多数为鞍钢工人。魏姓是坐地户大姓，村长、保长皆为魏家宗族控制，他们不但盘剥农民，而且在政治上也欺压农民。根据《土地法大纲》和《农村阶级分析》的有关规定，将保长、村长（他们都是地主分子）定为恶霸地主，并将其监禁。

城昂堡中心区管辖十多个堡子自然村，每村都是几百户，方圆几十里，工作队共有二十多个人，只好平均分配，一个堡子两个人，我们最大的才二十四岁，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因为村距较远，都学会了骑马，小同志则骑小毛驴，工作开展的很顺利，生活苦中有乐。

接连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解放鞍山的某部到城昂堡整训，在进行阶级教育和诉苦时，我们将恶霸地主魏保长拉出来示众，以他为典型向战士们揭露其罪恶，战士们边听边抹眼泪，并不时地呼喊口号。晚间那个被关押在西厢磨房里的伪保长跑掉了。这一事件提醒了我们：民兵队伍是严重的不纯，必须调整。

另一件是旧历正月末的一天晚上，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正和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开会研究分配土地方案。约摸十一、二点钟时候，有人气喘吁吁地报告说：来了“胡”子。他们藏在堡子北那条河边的秫秸垛里，人数、武器不详。这事管不管？我有一支手枪，三粒火，区里只有三个人。几束手榴弹。主动出击，人单力薄，恐寡不敌众，不出击，又恐失信于群众。权衡利弊，以出击为上策，随即决定出击，积极分子们听说打“胡”子，个个摩拳擦掌，争着同去。他们手操锄头、铁铤、木头棒子，组成二十几人的队伍就向河北出发，我们的行动较为谨慎，一过桥就悄悄地向前摸去，查看了地形，前后左右皆为开阔地。只有挨道边的右侧有一堵高不过半米左右的土墙。我们顺墙侧身向前望去，正前方的视野内有两个较大一点秫秸码子。正在这时后面一人跑到我

的身旁，一把将我拽到他的怀里就在这刹那之间，前面的手榴弹响了。（第二天察看弹着点离我只有二米多），我觉着身体一忽闪，裤裆里湿糊糊的，我摸了一把，是血，我朝秫秸码子里开了一枪呼喊着带领大家迅速地以“捂家雀”的形式扑了过去，因为我们的动作快，捂着了三个人，一转身影绰绰地见到好几个人从右边那个垛子向东北跑去，返回农会后，才看清我的棉衣棉裤被弹片打穿了不少眼。一块弹片打进了右大腿根的肉里，请来医生，用手术钳子夹了出来，擦巴擦巴就算完事，说来也怪，既未化浓，也未觉着疼痛，几天就好了。我们一面将这一情况立即向刘二堡团部作了报告，一面连夜提审那三个人，他们闭口不讲，我们只好将他们送到县公安局。

就在发生这次情况不久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命令我们全副武装前去黄泥洼地区蛤蜊坑（属刘二堡管辖）支援另一工作小组。当我们乘坐两辆胶轮大车前去支援时，战斗已经结束了，我们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得悉那四名同志中的洪家声和王声同志已经牺牲了。

这次事件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以洪家声为首的四人工作小组在黄泥洼一带进行工作。有人谎称工作队来人让他们回去开会，实际上是诱骗他们进入埋伏圈，这种人俗称为“拉线”的。他们立即往回走，当快进堡子时，炮楼上的枪声大作，同志们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一面还击一面寻找隐蔽物，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压的大家抬不起头。总算抢占了一座房子。但是洪家声同志一出大门就被炮楼上的敌人打中。王声同志向北突围，林森同志向南突围，敌人扔下洪家声同志去追赶王声同志，王声同志被敌人抓住后，被装进麻袋扔到太子河的冰窟窿里，这时洪家声同志因受重伤，乡亲们将他装到棺材里佯装已死。敌人返回后强迫打开棺材，见未死拖出来又补了两枪，这次事件是土匪“宽”字号匪帮（属国民党）所为，又因区中队叛变未能及时救援，致使两名同志牺牲，洪家声同志系回族，当地的乡亲按回族风俗把他安葬了。王声同志的遗体始终未找到。

事隔不久，经过群众的密告我们逮捕了“宽”字号的几名“拉线”的，查证核实无误，经上级同意执行枪决。

在刘二卜镇南部洪家声同志的墓地，开了公审也是公祭大会。为了进一步抓获“宽”字号匪首张德宽（沈阳解放后，在沈阳抓获处死）而留一活口，先将张振芝、王锁子二人执刑枪决。

不久我们全体同志就被省委调回，在辽阳市为群众演出了几场文艺节目后，回到了学校，

四八年夏秋之际，我们又组成两个招生小组，分赴辽阳和鞍山，笔者在辽阳地区招生。除在当地招收一批学员外，经青联介绍招收了不少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从国统区跑出来投奔解放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学校在扩大，学员的素质也有不同层次的提高。由刘相如编剧、于大波作曲，谢力鸣编剧、孙康作曲配合反封建会道门和宣传互助合作运动的歌剧《信不得》、《互助合作》相继上演了，演了很多场，对运动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辽沈战役期间，省委从学校先后抽调了两批一百多人集训，准备到新区工作和随军南下。并派刘相如、郝风、孙康和警卫员杜永年四人随军北上采访并准备接收沈阳的文化事业。

一九四九年春，辽南省和安东省合并为辽东省，省会设在安东市，我校遂由瓦房店迁回安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的建制取消，一部分人组建辽东文艺工作团，一部分人组建辽东省文联，同时派了一部分同志去鞍山帮助组建鞍山市各文艺团体。

白山艺术学校虽然仅有三周岁，但它却为党为人民培养了一大批艺术骨干和文艺行政干部。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篇文章只是根据个人所经历的事实和其它几位同志提供的情况草就。另外有很多非常生动的实例尚未搜集起来。因此，这篇文章只能反映出白山艺术学校某个侧面，即使是亲身经历的事情，由于笔者的政治素养、政策水平以及思想方法等原因也有偏颇之处。切望白山艺术学校的战友们不吝指教和热情提供有关情况，使这一史实较为正确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初稿于沈阳